

外交家曾纪泽

外交家曾纪泽

(1839-1890)

李恩涵 著

仓卒珠盘玉敦间
待凭口舌巩河山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外交家曾纪泽 (1839-1890)

李恩涵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交家曾纪泽/李恩涵 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 - 7 - 5060 - 7506 - 0

I. ①外… II. ①李… III. ①曾纪泽 (1839 ~ 1890) —生平事迹 IV. ①K827 = 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18131 号

外交家曾纪泽

(WAIJIAOJIA ZENG JIZE)

作 者: 李恩涵

责任编辑: 王 艳 孙立英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县新魏印刷厂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6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25

字 数: 26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60 - 7506 - 0

定 价: 48.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4258029



本书撰写期间（一九六四年九月至一九六五年六月），曾获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之资助。书成后，复蒙“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奖助出版，特此致谢。

著者自序

本书简体字版的出版，就我个人而言，实为一件盛事，使我能在已届八十三岁高龄的今天，仍然有机会重温过去五十多年努力献身于探索、重建与解释我国近代外交史事的某些人物与事件，并对于其成果作一番全盘性、概括性、鸟瞰式的检视与析论，真令我非常高兴与感激。想想我在四十七年前（一九六六）之出版本书，已是我投入研究我国近代史事之后所写的第二本书了（第一本书是《晚清的收回矿权运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一九六三，三七一页），它主要系以外交家曾纪泽（一八三九—一八九〇）的一生为线索，借着曾氏所从事的一些主要对外国的交涉谈判，如在中俄伊犁交涉（一八八〇—一八八一）中中国收回了部分伊犁（伊宁）的谈判，和他在中法有关越南交涉（一八八三—一八八五）中的许多项拟议，来描述分析清朝末年他进行实质外交所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困境，并试图站

在较高的视野与标准，以详述解析这些问题与困境所显示出来的相关子问题。由于我在此之前曾经在夏威夷大学与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做过两年研究生，曾经着力阅读过美国史重要的学术季刊 *Journal of the Mississippi Valley*（后改名为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与美国有关亚洲最重要的一份文史学术季刊 *Far Eastern Quarterly*（后改名为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内的一些佳作，对于历史研究中的“史实重建”与“史实解释”的两个范畴，已有了相当深刻的了解；所以，我在写作《曾纪泽的外交》一书时，除去努力在“史实重建”的层次上，想极力做到在所运用的资料方面，务必应包括我所能见到的中外相关资料（至少应运用中、英、日、法文中的资料），即所谓“多种文字、多种档案”（multi-language and multi-archival approach）的资料标准，而且应尽力之所及地利用在我这本书出版前的学考与论评考的研究与论说。此外，我也想特别着重本书写作的“外部形式”（physical forms）：引书（或引文）应详细注明该被引之书（或被引之文）的著者、书（文章）名、出版地、出版者（刊物名）、出版年（版本）、页码，以便于读者可以重检所用资料的可靠性为准。另在“史实解释”的层次上，我也希望能对当年曾纪泽外交的成就与局限，作出一些小规模的解释。因此，我在本书的“结论”一章中，曾就曾氏一生的外交事业予以全盘性的评论说：

如果我们将忠诚 loyalty、谨慎 prudence、善辩 debating skill、谋略 artifice、精确 precision、坚忍

perseverance、博学 knowledge、勇敢 courage、谦恭 modesty 等品性，作为一位理想外交家所应具备的条件，并用以衡量曾纪泽，可以说，他很够格。他忠诚谨慎，是得自于家教；他谋略优长，能言善辩，临危不乱，勇于任事，在他使欧（英、法、俄）八年的长时期中，也历有表现；他坚忍不挠、不向暴力低头的“挺经”精神，谦恭待人恂恂儒者的处世态度，更出自他父亲（曾国藩）的心传。但他最大的缺陷，实在于“博学”一项——缺乏近代外交的训练与深刻的国际政治（与国际法）知识。例如在越南交涉中，由于他对法国政治的了解不够深入，他似乎过分重视法国政党间对越南政策的歧异性，因而力主在越挫法凶焰，以求扭转局势。事实上法国侵越的形势已成骑虎，即使反对党继起当政，法国的对越政策，当也不会作何重大的转变，而接受他中法分护越南以中圻广平关为界的拟议的。而且，他将中国备战的实际情况，估计过高，他的外交行动，与清廷（中央）的决策，亦乏配合。因此，他向法国力争中越宗属关系的各项辩论，常被法人认为是“虚声恫吓”。这对一位外交家而言，实际在上述“精确”（precision）的原则上，犯下错误。而且他在与法国交涉时，举止过于直率，完全失去了外交家进退裕如的地位。他所犯的严重外交错误，系当法军攻陷（越南北部）山西后，法人欢欣庆祝，他以出使英法公使的身份，竟

在德国报纸上公开加以讥讽，并将山西之战与普法战争中法军在色当（Sedan）的大败相比较；法人大为愤怒，国会议员欲“倾国之力，以与为难”；德国外交部也认为此举“失体”。这可能是由于他的情绪激动，又对近代国际外交的惯例不甚熟悉所致。

但是，无论如何，像曾纪泽这样的人物，在当时（清廷内外）的大员中，已是凤毛麟角绝无仅有，何况他对近代西方的知识，一直都保持虚心学习的态度，实在已算难能可贵了。左宗棠称道他，“博通经史，体用兼赅”，“奉命出使，于交涉事件，随事执中，宽而有制，内则成乃父未伸之志，孝不违亲，外仍慎与国邦交之义，志殷补袞”，推荐他堪任两江总督的要职，“若畀以疆圻重任，必能肃海防而戢群族凌轹之气”，“张之洞虽名重一时，若论兼通方略，似尚未及曾纪泽也”。梁启超推崇他和魏源、郭嵩焘同为近代中国早期讲求西学的先驱人物。美史家马士（Hosea B. Morse）赞扬他为中国不流血的外交胜利，开创先例；都是很公允的论断。（见本书，页三二—三二五）。

本书在出版（一九六六）之后，我又运用类似的研撰外交史事的原则与标准，陆续写成和出版了 *China's Quest For Railway Autonomy, 1904—1911: A Study of Chinese Railway Rights Recovery Movement*（《晚清的收回铁路利权运动》）（英

文本，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一九七七，三一六页）、《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一九二五—一九三一》（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一九九三，三五六页）、《日本军战争暴行之研究》（台北：台湾商务，一九九四，四二九页）、《战时日本贩毒与“三光作战”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五六三页）等专书。而在这些专书出版的空隙年代中，我更汇集了同时期内我所撰写的一些研究性论文，出版了《近代中国史事研究论集》（台北：台湾商务，一九八二，六〇二页）、《近代史中国史事研究论集》第二册（台北：台湾商务，一九八七，四六四页）、《近代中国外交史事新研》（台北：台湾商务，二〇〇四，四八二页）、《注视日本新军国主义的动向》（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二〇〇七，二二三页——绝大部分的内容为时论性文字）等书。此外，未收入这些论文集的时论性文字尚有约四百页。我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同事王玺、吕实强、王尔敏等合编的史料集子，则有一万三千多页。

回顾我五十多年来长期辛勤耕耘的学术生涯中，我禁不住而热泪盈眶怀念起我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在家乡山东诸城去世的父亲与母亲。他们慈祥的面庞，多年来我都只能在梦境中追寻，但是他们对我的教诲，多少年来我总是牢记在心，终生服膺实践，不敢或忘。故乡的风物，也经常清晰地涌上我的心头。其次，我要深情地感谢我的爱妻吴艳玲女士五十多年来对我的协助与鼓励，使我可以勇猛向前迈进，无后顾之忧。我妻是一位出色的国民教育工作者，曾在台湾

担任小学教师达十三年之久，成绩卓越。后来因我于一九七三年应邀前往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她始中断此项她所热爱的教学工作，携带我们的两个儿子前往南洋定居达十七年之久。她在新加坡期间虽多正式从事小学教育的机会，但却兼任华文教育多年，颇有成就，曾教育出两位相当优秀的学生，一位在小学会考中为获得最高分之一人；一位获得新加坡总统奖学金，赴牛津大学及耶鲁大学留学深造，返国后更担任海军高阶职位，成就很大。我们的两个儿子也在新加坡双语教育的扎实基础上，于自己选择的事业轨迹上努力前进，老大柏恒于顺利取得伯克莱加州大学机电工程学博士学位（专业为 optoelectronic materials）之后，任教于尔湾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Irvine）电机系（二〇〇四年即升任为正教授之职了）。老二柏毅则于美国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 Indiana）电机系毕业后，即任职于数高科技公司，曾派驻美国、中国香港等地，颇多表现，现则在某大企业中任职。在我八十三岁的高龄岁月中，子孙们都能各组美满的家庭，健康和乐，奋发向上，各自站在不同领域的岗位上努力不懈，都是使我和我的爱妻（她已七十六岁了）精神舒畅、生活安乐的巨大支持力量啊！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日谨志于台湾新北市板桥

再版自序

我很高兴我在一九六六年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与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所共同出版的《曾纪泽的外交》一书，现在又有了再版的机会。我愿借此机会将该书研究与写作的缘起与其出版后直接间接的一些小问题，略为说明一下。

本书最早是以我在美国夏威夷大学（University of Hawaii）历史系所写硕士论文的形式出现的，原题为“Tseng Chi-tse (1839—1890): A Diplomat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January 1965)，指导教授为 Werner Levi（著有 *Modern China's Foreign Polic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53），Daniel W. Y. Kwok（曾著 *Scientism in China*,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与 James M. McCutcheon 三位教授。我去夏威夷大学就读，是由于我在一九六二年春考取了台湾教育主管部门所主办的美国政府赠给的“夏威夷大学东西文化中心”

奖学金（East-West Center Fellowship, University of Hawaii）第二届学生的关系，这项奖学金供给所取学生所有在美两年的学费、生活费、旅行费、书籍费，甚至每月的零用费等等，全年奖学金高达美金四千五百元以上（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字，因为当时美国州立大学全年学费不过数百元），所以，教育主管部门对于奖学金学生的选拔，不只非常严格，而且在人数上每年也只有十二人至十五人，而每系各只一人入选。由于我微幸入选，使我得以在夏大专心向学，除去加强了我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原已奠定六年基础的有关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与西文汉学著作的阅读之外，我大部分所攻读的课程，尤着重于对美国史的研究，每晚均读书至半夜十二时，天天如此，奠定了我此后于一九六八年前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以美国外交史作为我笔试的第二科目的基础（我在加大的主要美国史教授为美国外交史名家曾任数届美国外交史学会会长的 Professor Alexander DeConde）。此后，我更在夏大“东西文化中心”的资助下，转赴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了一个学期，而于一九六三年暑期畅游美国大陆，从事我第一次横贯美国大陆的旅行。其间更专访波士顿附近剑桥的哈佛大学与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做为期月余的访问研究，至今留下许多愉快的回忆，非我此后四次游美中再访这些美国学术重镇的心情所可比拟了。

当我在夏威夷大学苦读时，曾于夏大图书馆内发现 Charles and Barbara Jelavich, eds. *Russia in the East, 1876—1880, the Russo-Turkish War and the Kuldja Crisis as Seen*

Through the Letters of A. G. Jomini to N. K. Giers (Leiden, 1959) 一书，翻阅之下，立刻引起我对研究曾纪泽的极大兴趣。因为两位编者原系十九世纪后半期俄国著名外交家外务部侍郎热梅尼 (Aleksandr Genirikhovich Jomini) 的后人，他们在俄国革命后即流亡西欧与美国，而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在柏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从事研究工作；此次他们更将其所携家藏先人热梅尼致当时俄国外务部尚书格尔斯 (Nicholas K. de Giers) 的有关中俄伊犁交涉与中土战争的外交公务函件公布，而这些函件实在都是研究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俄外交问题非常重要的俄方外交文件。而且，这些函件均用法文写成（当时帝俄在文化上多仿效法国，其内部外交文件，甚至其上流社会的一般彼此通信，均多用法文撰写），而我个人自一九五九年起，即从台北市天主教耶稣会数法籍会士研习法文近三年，这次正可派上用场。所以，我决心以“曾纪泽与中俄伊犁交涉”作为我写作硕士论文的题目。后来，我在返回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之后，更将原撰英文论文予以扩大，改用中文写成本书。

此外，有两点事实我想在此略予澄清。第一，与我在夏威夷大学发现了 Charles and Barbara Jelavich 两位所编辑的前述书籍之约略同时，加利福尼亚大学徐中约教授 (Professor Immanuel C. Y. Hsu) 也体认到此书的重要性，并决定从事于中俄伊犁交涉的研究。徐教授后来成为我在加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指导教授，他治学严谨，著作繁富，是我所敬佩的一位优秀学者。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The Ili Crisis: A Study of Sino-Russian Diplomacy, 1871—1881* (London, Clar-

e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系由牛津大学出版部于一九六五年出版。徐教授与我的研究, 在彼此之书出版之先, 完全是各别进行, 我俩都是互不相谋的独立研究。徐教授的大著名义上虽为一九六五年出版, 实际至次年(一九六六)年始正式发行; 而我所写的本书之印行, 实始自一九六五年秋天, 而在一九六六年五月, 即已公开发行了。所以, 徐教授的英文大著与本书实际是约略同时问世的。第二, 已故袁同礼先生译辑上述 Charles and Barbara Jelavich 所编资料而成的《伊犁交涉的俄方文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之二)一书, 更是在本书撰成发行之后才刊行问世的。本人在撰写本书完成之后, 才获知袁先生有译该书之举, 所以, 对于袁氏译著并未引用。

此外, 在本书再版的时候, 让我对我妻吴艳玲女士在本书撰写期间所给予我的鼓励与协助, 表示挚爱的谢意。她含辛茹苦, 以敦睦亲族与教育两儿为重。她教育两儿非常严格, 与我的宽松放任, 大为不同, 本年(一九八二年)长儿柏恒在柏克莱加州大学获得“金钥匙”的荣誉(Tau Beta Pi Society Membership,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hapter), 次子柏毅在新加坡公教中学本部四年级就读, 也获得了一些学业上的荣誉, 当为她严格督教的收获之一吧!

新加坡国立大学 李恩涵谨识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一日, 时休假客居台北市

前 言

曾纪泽（一八三九—一八九〇）的外交成就，无论在他生前和死后，都很受到中外人士的称赞；在清季外交史上，无疑地，他是一位卓越的人物。如果我们将鸦片战后的清季外交，划分为三个阶段：从道光廿二年《南京条约》签订到咸丰十年《北京条约》签订为第一期，从《北京条约》签订到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为第二期，从甲午战争结束到宣统三年清室退位为第三期；那么，曾纪泽则是属于第二期的我国外交家之一。

当时我国已历经创痛，西方船坚炮利的事实，已被普遍承认，在对外的政策上，亦已作过重大的改变：除允许各国公使入驻北京外，并特设总理衙门，命亲王重臣主持，以负与外人折冲之责。对于东西各国的情势，亦力求了解，光绪元年后，并分遣使臣驻扎欧、美、日本等重要国家，开始建立中外对等的外交关系。

就列强对华的态势来看，在英、法、俄、美等国的先导下，虽然已经运用武力、外交交替使用的方法，打开了中国的门户，强迫中国接受了中外通商的事实，并攫取到不少特殊的权利，但在整个第二期内，它们对于广土众民的中国及其所蕴蓄的潜力，尚颇具戒心。它们的觊觎图谋，初尚侧重于经济与文化方面；其政治性的攫夺目标，亦暂以中国的藩属与边地为限。曾纪泽在此期间历任外交要职，于中国对外政策的筹议与定策，乃至实际外交的因应与周旋，几均身预其事，费尽心力。

曾纪泽的外交事业，发轫于光绪四年之奉命出使英法，稍后更兼使俄国，前后旅居欧洲八年。及奉召返国，又以兵部侍郎，兼海军衙门帮办大臣，并被授为总理衙门大臣之一。他的主要成就，自以光绪六七年间的中俄伊犁交涉，最为人所艳称。他挽救了一次迫在眉睫的中俄战争，并以较少的代价，索还了已经丧失的部分要地。其次，他对中法越南的争议，也有独到的见解，首先指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其间虽因清廷措置失宜，举棋不定，坐失有利的时机，但他所志所事，即使其敌对的一方，对于他判断的敏锐，辞令的犀利，亦深表钦佩。此外，他在中英鸦片加税免厘与缅甸问题的交涉中，也有出色的表现。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他撤废不平等条约的建议，甚至还提出了具体的撤废办法，其卓识远见，洵非时人所及。

从曾纪泽对于近代国际政治的了解和运用来看，他不只已经掌握到中外交涉中最具关键性的一些问题，而且已能运用欧洲的均势，以维护中国的基本利益；能够利用各国内部